

关于汲古阁的校勘问题

孔 毅

汲古阁毛晋是明清最重要的刻书家之一，他以一家之力，遍刊四部，兼及佛道，影响可谓大矣。但他所刻的书又常遭人非议，矛头无不指向其校勘。毛晋之友钱曾著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就有：“启祯年间，汲古之书走天下，罕为辩其讹舛者，予拟作《毛板刊谬》是正之。”（卷一）孙从添《藏书纪要》也说：“毛氏汲古阁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校对草率，错误甚多。”那么毛氏的校勘究竟如何呢？

一 重校勘 备善本 请专家

明代后期，坊刻蜂起，辗转翻刻，无所校勘，甚至改换名目，删头去尾，化整为零，以求速售，清人多以焚书喻之。毛氏反之，多不改古人书之议。

他在《曾子固题跋跋》中说：“余尝论《东观余论》力排六一居士《集古录》瑕处，将谓吹求无剩矣，及阅子固跋中如江红、二三、周昕、李翕之类，不得不正永叔之失。子曰：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，今亡已夫’。苏子瞻所以痛戒妄改古人文字云。”其《癸辛杂识续集跋》则有，“字句之间虽多本本、饥飢之嫌，向守东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，故缺疑耳”。对苏轼不改古人之说极为欣赏，对于刻书存旧之旨反复致意。

但毛氏刻书又非全依旧本翻刻。只要看他《寒氏联珠集》、《剑南续稿》等亲笔校改付刊底稿，就可知其校勘的用心了，他撰写的题跋往往颇有精审之见，也决非那些稍事翻阅，即兴提笔

者可以完成。

毛氏藏书丰富，欲刊一书，多可备数本，往往按其时代、优劣，分清主次，决定何为底本，何为参校，如李贺《歌诗编》，先后得到三个善本，最后以鲍氏本付刊。所刊又以全本为限，对当时坊刻不用善本，删削改易，甚多讥议。他在《春渚纪闻》跋说：“江南藏书家指不易屈，姚叔祥谓沈虎臣多蓄隐，遂抽伊架上何薏《春渚纪闻》，与陈眉公梓入《秘籍》，亦知有脱遗，余今喜得全本，凡十卷，亟公同好。”在详述二本优劣多寡后，又说：“然半璧亦能宝藏，叔祥可谓身到处莫放过矣。”于《秘册汇函》本备录其弊，踌躇满志之情，真是跃然纸上^①。

有异本则须多校勘，其参与者，有江阴周荣起等，皆为一时宿儒。佛经、本草之类则另聘专家。毛晋刻《径山藏》多由道源主校，《常昭合志》卷四十一说他“晚归虞山，仪貌清古，不招徒众，专禅讲，博极经史。”可称得上佛门专家。《神农本草经疏》是缪希雍所著，他在序中说：毛氏“即集同里门人李枝、通家子云间康元宏、松陵顾澄先二文学，并其舅氏隐沦戈汕辈，董理校讎，早夜孜孜，惟恐或后，其用意可谓勤矣。”此书为毛晋所刻，序中所称的李枝，字季虬，为缪氏医术亲传弟子；顾澄先为缪氏“按部类选，汇得全帙，细复检阅，以为定本。”^②可见也通医道。康氏曾为毛晋校《奕律》等书，与戈汕一样都是熟于校勘之道者。得此数人努力，《神农本草经疏》刊成。前此，‘门人李季虬氏几经参录，悉以付新安吴康虞氏，未竟而遗焉，流传于知交者，西吴朱氏集而刻之，不及其半，然且序次弗伦，考核未审也”。这就是用不用专家校勘的区别吧。

二 校勘特点

综观汲古阁刻本，可见其校勘特点有二。

其一，毛氏于字句异同，勤于对勘而疏于抉择。毛氏校勘用

本，见诸题跋者，即有宋、元、明本，钞本，道藏及多种名目之别本，其刻本不出此，即出彼，绝少无根臆想字句。以上述《寒氏联珠集》为例，毛氏以钞本为底本，用刻本《唐诗纪事》相校，得异文数十处，斟酌后，少数字旁加“L”，作为采用标志，写工照抄。再如《毛诗正义》引《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闽本、监本都将作者写为“陆机”，独毛本作“陆玕”。他在《诗经草木鸟兽虫鱼疏跋》自我辩解道：“或曰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机作也，或曰唐吴郡陆玕作也。陈氏（按：此当指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者陈振孙，此条见原书卷二）辩之曰：其书引《尔雅》郭璞注，则当在郭之后，未必吴时人也。但诸书援引多误作机。案机字士衡，晋人，本不治诗，则此书为唐人陆玕字元恪者所撰无疑矣。”考作者非晋陆机固有道理，但陆氏的名姓、籍贯、官衔已见《经典释文》，《释文》是陆德明陈至德初的著作，陆机为隋以前人无疑。毛氏对引用《释文》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自刻的《诗经释文》也未细审，而改《正义》原文，粗疏之极，但此乃从《资暇集》及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片言之说，不是凭空臆想。改《诗经正义》中杨雄作扬雄，与此略同。

毛晋对校勘所需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，选举、职官等典章制度都未深究，对版本、目录之学也不很精通，虽欲存古本之原貌，但对何为原貌、何为错讹，不能辨析，他断语多误，实在是难以避免的。

其二，毛氏对各书佚文勤于补阙，而疏于考证。毛氏刻书常备异本，经过对勘往往可以有所补遗，唐诗、宋词、历代笔记，有的三条五条，甚至一卷二卷，对保存古典，贡献不小。缺点是贪多务得，不及细考。如《剑南诗续稿》，毛晋抄自绛云楼残宋刻本，跋云：“其间未刻者，止得古诗一首，律诗二十有三首，绝句二十有六首，依旧詮次，作《逸稿》下卷，聊补《剑南》之遗云。”据孔凡礼考定，其中多混入李纲、邓肃、邓祚的作品，

《成材将还盱江幕以诗四首为贶》等已见《梁溪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八，《罗浮山》等五首咏广东山水，为陆游足迹所未至，诗中多提及李舍人、德夫、彦成又都是李纲之友，而与陆氏无缘，毛氏却一概收入^③。他的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，凡付雕梓的，诗上均有一图记，似毛氏与《剑南诗稿》对过，而未曾一一考其真伪。

可见，毛氏对伪本、伪篇的考辨，不很重视，其考辨之术又不很当行，所据往往限于原书序跋，《通考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隋、唐经籍志》等数种，引用诸说又多不翻原书以寻根究源，比之清代乾嘉诸儒无征不信、孤证不信，当然是大为逊色了。

三 辨伪校勘体例

但必须肯定，毛晋对作者是非、书籍真伪并不是一概不问。他在《癸辛杂识别集跋》中说：“余正诌《秘籍》、《稗海》诸书甚多贋鼎，即真者十逸其五，每思拈出有关风雅者，逐一厘正流播，为古人吐气。”发现书之作伪、篇章之混淆、作者之歧异，有的删去，有的存疑，试述其例如下：

（一）对书之真伪，有时在跋中辨别，这种情况较少。如《子贡诗传》，跋称：“其真贋未敢臆决，姑俟博雅君子。”但是他的朋友胡震亨、姚士麟已考定为明丰坊所伪造，毛氏不知。《乐府古题要解跋》虽用《乐府诗集》的引文，证《要解》与《乐府解题》有混淆之处，却未将其与郭书逐条相核，否则定能发现掇拾、剽窃之迹，功亏一篑，实在可惜。

（二）对作者、著作时间不可考的，毛氏就列诸说于跋，虽多列而不断，但如《梦溪笔谈》、《诗经草木鸟兽虫鱼疏》能定于一说的，也有数例。

（三）篇章之伪，毛氏校出较多，其处理有一定的方法。

他在《六一词跋》中谈及：“凡他稿误入，如《清商怨》类，一一削去；误入他稿，如《归自谣》类，一一注明；然集中更有浮艳伤雅不似公笔者，先辈云疑以传疑可也。”

删伪例：《山谷词·满庭芳》调下注：“旧刻六首，考北苑春风是秦少游作，删去。”

处理混淆例：疑而未定，题下添注，二者有异同，则标而出之。《山谷词·鹧鸪天》下注：“或刻苏子瞻，但‘山边白鸟’作‘山前白鹭’，‘如今更有’作‘于今尚有’，‘底事’作‘欲避’云云。”

增补例：《淮海词》末二阙下注，“此二阙旧本逸”。是据底本标出，《六一词·渔家傲》又阙下注“以下元刻续添，次《玉楼春》后。”乃据参校本增；又有据地志、诗话而增的，都注明来路。

这些《宋名家词》中辨章考镜的注解，是毛晋用心之作，为近代校刻词集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。后来毛扆校诸词集，补《九僧诗》，例亦同此，而质量又出其上。

毛晋校勘付刻亦有一定之规。他早期所刻《屈陶合刻》，已用“宋本”、“旧本”、“今本”、“朱本”、“史书”相校，书后各有参疑一卷，即今天的校勘记。如《陶集·停云诗》“尊湛新醪”后校语作“一作尊酒新湛”。“竟用新好，以招余情”。后校语作“一作竞朋亲好，以怡余情”。间有考证，如考“饮鴆违帝旨”引《山海经》云：鴆字从鸟从丕，宋本作鴆非。后附校语，更因《隋志》、《唐志》考《陶集》卷次，篇数沿革。（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三有此书跋，虽然认为其校讎未精，却也承认其从宋本绣梓，尚有典型。从校勘上说毛晋和乾嘉高手卢文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）

此种校记后置之法，毛氏运用不多，（《径山藏》毛氏所刻校记虽少而实如之）逐渐演化为三种形式：以一书为底本，径行

刊入，无所校勘，如《津逮秘书》中诸题跋、诗话，其一也。校勘以后，择善而从，径改原书，如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，其二也。校勘以后，确定是非，但存异文，如唐诗、宋词，或注一作，或注宋本、元本、时本，其三也。

无疑当以其三为较好方法。以刻本对比手校本可知，即使刻本出异文也是经过选择，并非全录校语，手校本校语往往多而且详。其子毛扆由此发展，校勘更细，更详，点划必校，而逐渐演变为乾嘉时黄丕烈的校法。毛扆《松陵集跋》曾详细论及自己的校勘体例，略为：（1）字体异而音义同者可勿改；（2）分毫增减，截然二字者，举世沿习，莫知其非者，皆校改之；（3）错字别字，虽宋刻已失，亦为校改。分析改与不改的情况，以细致为特征，所以他手校宋词等书后人奉为至宝——以此例校书出校语可以。但是谈到刻书，则毛扆也是一个喜改原文的人，《说文解字》五次挖改，是个最好的例子。因为他功力有限，碰到字句歧义，不知何取何舍——仅以此例刊书改字，实在不易成功。这大概就是毛氏父子校本既为人所重，刊本却又时为人所轻的一个原因吧。

总之毛氏刻书多经校勘，撰写题跋，再付梓人。这在当时应试选本、评本，事文类聚充斥，普遍不讲校勘，不讲版本的出版界中是难能可贵的，对清代精校精刊又有开风气的作用。水平不高，功力不深，应该说是时代的局限，不能一概怪罪其本人。

注：

①毛晋所刊《春渚纪闻》第九卷中脱落一页，未及检点，毛扆后得宋刻，才能补此缺页，但因版已质他人，无法补刊。此页卢文弨刻入《群书拾补》。

②《神农本草经疏凡例》。

③《陆放翁佚稿辑存考目》，孔凡礼作，见《文史》第三辑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